

每当我从这里走过，仿佛就能听到那阵阵沙场秋点兵的号角。这里是辛弃疾纪念祠，它坐落在大明湖南岸，遐园西侧，约百米处的一片绿荫里。远看，黑墙灰瓦，在摇曳的绿荫里，神秘而静谧。近看，石狮、照壁、门楼、飞檐、朱漆、高匾，透着一股墨色的历史沧桑与古韵，让人一望便陡生一种对遥远时空的遐想。

这是一组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宦家庭式的建筑，由南向北，三进院落，占地约1400平方米。说起它，就不得不从晚清重臣李鸿章起笔。

1901年，李鸿章死了，死于胃病咳血。慈禧下诏晋封李鸿章为太傅、一等肃毅侯，谥文忠，并敕令在其原籍及其各立功省份建祠10处以示恩宠。现在的这座宅院就是这十处中的一处。它建成于1904年，为时任山东巡抚周馥督办，称李公祠。

随着清帝国的土崩瓦解，李公祠逐渐凋零破败，直至埋没在了历史的荒草杂芜中。1961年，济南市人民政府对它进行全面修缮。修缮后的李公祠改为了辛稼轩纪念祠。

辛弃疾(1140年-1207年)，原字坦夫，改字幼安，号稼轩，济南人，追赠少师，谥忠敏，是南宋时期杰出的军事将领、豪放派词人。

辛弃疾出生的时候，“靖康之变”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他的家乡早已被金国占领。他在整个青少年时期，亲眼目睹了金人对汉人的欺凌与压榨，在他祖父辛赞的教育下，很小就立下了抗金复国的大志。

21岁那年，金人大举入侵南宋，为了策应南宋抗金，辛弃疾在家乡拉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加入了由耿京领导的起义军，并任掌书记一职。在这期间，辛弃疾做了一个被世人赞曰“壮士英慨，儒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息(洪迈《稼轩记》)”的壮举。那年，耿京派辛弃疾去南宋朝廷联络起义军南归事宜，不料，辛弃疾在完成使命归来后，面对的却是耿京被叛徒张国安刺杀，起义军队伍溃散，张国安投金的局面。辛弃疾大怒，提枪跃马，带领五十几名壮士，杀入了拥有数万人之众的金营，将叛徒活捉，又马不停蹄地狂奔千里，归南宋，交由宋高宗处置(斩首)。此事，威震南宋上下，辛弃疾一举成名。

回归南宋后的辛弃疾，本以为可亲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王爱竹

谷子，籽粒带皮的称为“粟”，去了皮的叫“小米”。它是我国最古老也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，当数“五谷”之首。汉语中代指国家的“社稷”一词，其中的“社”是土地，而“稷”就是谷子，可见谷子在我国农耕文化中的地位。

济南著名的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，据考古发掘证明，距今已有四千多年，是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息繁衍的聚居地。龙山小米是“龙山三珍”(黑陶、小米、豆腐)之一，作为贡米，口感、营养、品质之佳，自不待说。在这一带，直到解放初期，谷子的种植一直占大田作物的主导地位，小米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主食。乡亲们口中的“家常便饭”就是：小米熬的“饭汤”、小米面为主做的窝窝头、大饼子，外加一盘萝卜咸菜。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这里的窝窝头，特别是大饼子，如同泰山、沂蒙山一带的煎饼，很具有地方特色，是当地人最可口的“干粮”。龙山镇的大饼子，是以小米面为主，掺加少量豆面合成的二合面，或再加玉米面(或高粱面)配成的三合面做成(纯小米的硬，加了豆面才喧腾)。沂蒙山的人出门要带一大包袱煎饼，而龙山镇人出门怀里要揣上大饼子。

作为主粮的小米，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方人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。

例如，“生孩子，养满月”，小米黏粥加红糖是当地孕妇“养月子”的必备营养品，经验告诉人们：小米虽然极普通便宜，但没有再比“小米黏粥”更能迅速恢复孕妇体力的。

再如，每遇白事，主人招待吊唁的宾客以及帮忙的街坊、亲友，筵席上的主食一律是小米干饭。即便是富户人家，也不用白面馍馍，至多是在小米中



明府城史话

大明湖畔忆稼轩

□苗培兴

率王师，北伐中原，收复失地，实现他抗金复国的夙愿。可此时的南宋朝廷却早已厌倦了战争，不思进取，只求偏安一隅，辛弃疾的凌云壮志难以实现。他的壮志越是高远，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就越是强烈，他生命的悲哀也就越是深重。

辛弃疾初到南宋时，先是授承务郎，后拜江阴判官。再后来，他辗转多地为知府、安抚使，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、绍兴、镇江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在这一时期，他无时无刻不盼望着北伐中原收复失地，每到一地，便在治理荒政、治安等政务的同时，积极备战，准备一旦朝廷有令，便挥师北上。辛弃疾曾上书《美芹十论》《九议》等阐述抗金复国的方略，督促朝廷下决心北伐。也曾亲率大军在江西一举剿灭为祸多年的“茶商军”叛乱，在湖南训练过一支骁勇善战的“飞虎军”。然而，他的这些真知灼见和军事指

龙山小米与章丘铁匠

加些豇豆、绿豆，把佐餐的汤菜质量尽量提高一些而已。其次，再简陋的丧事，棺材前，甚至是草席捲裹的尸体前，也要供一碗“倒头饭”，这是在圆鼓鼓的一碗小米干饭上插一双筷子做成的祭品。其他祭品则可有可无。因为小米是生前死后都必须吃的主食。

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它和“章丘铁匠”的关系。“打铁还须自身硬”，抡大锤的必须身强力壮，饭食自然马虎不得，可是打铁的都是下苦力的穷汉，哪能整天大鱼大肉！龙山小米就成了首选。章丘铁匠手艺的传承源远流长，也许自古以来，章丘铁匠的饭碗里，无一例外都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。

章丘铁匠大抵分两类，一是集镇上的铁匠铺，一是游走四乡的铁匠炉。前者一般技术力量雄厚，接一些大型的技术含量高的活，收入较高，生活也稳定，但数量少；更多的是后一种，这是一种流动性的家庭作坊，以打造、修理农具和小型的日用铁制品为主，一般由三至四人组成：为主的是年长的一家之主，是大师傅；其次是一个或两个打锤的，这打锤的不是师傅的儿子，就是他的徒弟；另外加一个拉风箱的，要兼做炊事员，一般是大师傅的妻子或幼小的子女。铁炉、铁砧、铁钳、大小铁锤……一应打铁家什，三四人的行李铺盖、锅碗瓢盆……一切生活用品，统统装在一辆木轱辘的独轮车上。打锤的壮汉在后面推，拉风箱的小孩在前面拽，大师傅则像牧羊人一样在后面跟着。不由让人想起居无定所、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。

老远听到吱呦——吱呦——吱……村里人就知道打铁的来了。车子进村选一个空场，生起炉灶，支起铁砧。



挥才能却未能被采纳和重视。这样，辛弃疾始终在一种压抑沉郁的精神里煎熬着，可谓：一腔热血空对月，满腹韬略枉自谈。

终于，43岁那年，正值壮年的辛弃疾遭主和派谏官弹劾，被罢官闲居。闲居地在江西上饶的铅山附近。之后，在长达25年的岁月里，辛弃疾有二十多年都是在此度过的，被迫做了陶翁。其间，虽有两次被招为官的经历，但时间都不长，加起来也不足五年。1207年10月3日，辛弃疾在无奈的叹息声中，带着满腹的忧郁和愤懑走完了他的一生，享年68岁，墓葬铅山县南十五里的阳泉山。据说，辛弃疾在弥留之际，瞪着浑浊的双眼，高呼“杀贼、杀贼”数声，那声音满是悲愤与凄凉。

辛弃疾的一生是悲哀的，理想与现实出现了巨大的矛盾，他长期受主和派压制，雄才大略无处施展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境遇，才铸就了他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诗人的特质。他把“男儿到死心如铁”的倔强与刚毅，把“看试手，补天裂”的凌云壮志，把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万丈豪情，融进了文字，化作了一首首不朽的诗篇，成为中华文明永世的骄傲。

今天，当我们走进这里，走过这一个个小院，看过这一幅幅图片，读过这一段段文字，尤其是与辛弃疾(铜像)那双无限苍茫的眼睛对视后，我们的思绪就不会再平静了，会像这大明湖的湖水一样潮涌。在这不尽的潮涌中，我们的精神就会变得高昂，变得无比的高昂……

【泉城忆旧】

□陶玉山

这铁砧是用三股叉的老榆木墩子倒放在地上做支架，把洗脸盆大小的铁砧帽扣在上面而成，有半人来高，这是打铁的“工作台”。不一会儿，“呼嗒，呼嗒”的风箱声和“叮叮咣咣”的打锤声一起响起来，在村人拥挤拥挤的围观中，铁匠生意开张了。

快到饭点时，拉风箱的把小米淘净放进锅里蒸干饭。这锅是打铁的专用饭锅，样子很特别：像个倒放的放大了的武士头盔，锅沿两边有半圆的提手，比一般锅深得多，蒸一锅干饭，足够四五个人用餐。铁匠师傅住宿只能“随遇而安”：有时睡在好心人家的大门过道里，有时宿在村头的破屋古庙里，有时就蜷缩在场园的柴火垛里，要不干脆就在街口树下打地铺……

作为一门手艺，打铁在章丘的普及度非常高，有些铁匠密集的村镇，几乎是“村村铁匠铺，家家打铁人”。我的街坊有好多还是“铁匠世家”，有一次和李大叔闲聊，他说起了自己的家史。他说：我爷爷和我姥爷当年都是串乡打铁的，都有一个坏毛病——赌博。姥爷手艺比爷爷高，可赌博却总是输给我爷爷，越输越不服气，越不服气越输，最后几亩薄地也输光了，押无可押，头脑一昏，孤注一掷，把个大闺女押上了——这大闺女就是我妈。姥爷输得屁股精光，无奈之下，推起铁匠炉独轮车子一家人下了关东。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，几年后，姥爷在关外发了大财：我爷爷却还是个穷“打铁的”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姥爷疼闺女，有意拉扯女婿，便把我爹带去关东打铁，谁知不到半年，他就跑回来了，理由是吃不惯那里的饭：上顿下顿不是玉米糝子就是高粱碴子，咱打铁的哪有不吃小米的？家里再穷也不去了！

【泉城忆旧】

红星影院看电影

□陶玉山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电视机还没有全面普及，市民娱乐项目匮乏。有些地方，譬如笔者居住地南辛庄附近的部队营区八团、通讯营等每周会放映一场露天电影，露天看电影虽然满足了看电影的欲望，可是，不尽如人意之处多多。首先环境比较吵；其次，放映的影片几乎是看了好几次，一些台词都能倒背如流的老片子；而有空去电影院里买票看电影则成了大多数人丰富业余生活、开阔眼界的一个重要事情。

那时距离我家比较近的电影院是红星影院(后来改回原名明星影院)。红星影院在经六路和经七路之间纬十二路的西边，青砖墙面，坐西朝东，三层，正立面为传统的大屋顶形式，平面呈“工”字形，中间部分向内微凹；一层前厅入口的上方建有一前伸的平顶遮雨平台。整个建筑造型看上去古朴典雅、端庄大方，极具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公共设施建筑的风格，时代特色鲜明。在楼房很少的年代，红星影院是当时十二马路很有名的地标式建筑。如果你向人打听路，对方会说，你沿着红星影院往东或往西走，大约多少米就到了。

作为居住在济南西部的人，当时没有特殊情况，看电影都是去红星影院。喜欢看电影，尤其是在电影院里看，是当时的学生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初中生的愿望。可是，看电影是需要花钱买票的。平时大家看电影是一毛二一张票，赶上宽银幕或彩色的电影，还有上下集的，得花两毛五。现在看来，几毛钱微不足道，可当时普通工人一般月收入只有三四十元钱。别的不说，六分钱就可以买个烧饼，一斤花生油不过八毛五。作为我们学生，一般都是没有零花钱的。喜欢看电影就像喜欢玩耍一样是天性，我们就想方设法满足欲望。课余时间就在电影院入口处转悠，看到检票的和熟人说话，或没有留神，就悄悄地快步进去。当然，成功的次数是和被逮住的次数不成比例的。逮住后挨一顿骂，甚至被踢几脚都是司空见惯。更多的时候则是转悠了好长时间，电影早就开演了，还是没有机会进去。只好带着些许失意，慢吞吞地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。

1978年的冬天，一部上下集的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在我国上映，空前轰动，一票难求。“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，贼的儿子一定是贼”这句台词，不长时间就成了大家的口头禅。曲折生动、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经过口口相传，更是勾起了人们一睹为快的念头。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家观看的要求，每个影院不得不加放场次，甚至深更半夜都安排了。观众平时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，对两毛五一张的票价却根本不在乎，如此慷慨大方很少见。

尽管过去了整整四十年，至今我还记得自己看这部电影的时间是当天的最后一场，午夜将近一点的时段。三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，几乎到了凌晨四点。随着看电影的队伍一路西去回家，漆黑的夜里响起了《流浪者》主题歌《拉兹之歌》跑调的声音，抑制不住亢奋的我虽然记不住歌词，但也随着大家哼起了那格外喜欢痴迷的音乐……

可惜的是，后来，这座先后被济南市政府和山东省政府公布为市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老建筑先是成为饭店、洗浴中心，后又成为烤鸭店等。这两年已经关门停业，成为一处闲置的建筑……